

新亞書院誕生之前後

張丕介

本年（即一九六九年——編注）九月二十八日是新亞書院成立二十周年校慶日。本校將舉行慶祝，來紀念這個意義深長的日子。校慶紀念籌備會，決定編印校慶特刊，公推王佶先生和王德昭先生編輯，並約請本校同人分別撰文，搜集歷年生活圖片資料，擇要刊出，以資回顧與前瞻。王先生囑丕介為文簡述新亞書院創立之經過，因當日參與創校之人，由於種種原因，離校者日多，而留校者愈少，對當年艱難締造之經過，傳聞雖多，而往往與事實有所出入。丕介僥倖追隨諸全人之後，躬逢其盛，且二十年來獻身於新亞書院，未嘗間斷，對當日之情形，所知較詳。故王先生所囑，不敢堅辭。不過「不見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。以下所述，或不免記憶上有錯誤，至盼讀者原諒，並惠予糾正，以便異日修校史者參考。

新亞書院之誕生，適逢我國憂患重重的時代。中國大陸在八年抗戰勝利之後，突然陷入一場空前的浩劫。整個國家民族，以及數千年之傳統文化，面臨着存亡的威脅。舉國上下，悽惶不安。文化教育界所謂知識分子，更為徬徨，雖報國有心，而自保無力，只好四散逃竄，抱着復興傳統文化的種子，尋求可以暫時偷生的地方，以期把這種子播到一片乾淨土上，讓它萌芽茁壯，然後開花結果。由於這種形勢與苦心，於是創造了我們這一所小小的新亞書院。我們可以說，這樁小小的教育事業，生於憂患；而且，當工作實際進行時，情形並不如想像的簡單，其間充滿了曲折，充滿了辛酸。我們回顧新亞書院誕生的經過，和它誕生之後最初幾年中所遭受的磨折與痛苦，真是不勝感慨系之。

一九四九年夏初，我隨同逃亡大潮，來到香港。我的計劃是在這個英國統治

下的自由港，編刊一種定期刊物，就是隨後出版的「民主評論」半月刊。這是戰後在香港最早出現的一份大型雜誌，半月一期，標榜着明顯的原則：政治民主、經濟平等，和學術思想自由。我與徐復觀先生分工合作，他負責籌措經費，打開對外發行的關係，我負責徵集文稿，編輯和校對等事務。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，創刊號出版，許多朋友表示讚許，我們乃決定正式發行。那時最重要的問題是缺乏適當的文稿，所以盡量聯絡能撰寫此類文稿的學者。這時錢穆、唐君毅、謝幼偉諸先生，差不多同時到港。這幾位先生是我在南京辦「學原」時期的舊友，此時成了「民主評論」的主要作者，又是一般讀者所熟悉的名字。他們的文章的確為「民主評論」生色不少。我們幾乎天天見面，討論時代問題和思想問題，非常投機。在談話之中，我獲知了他們原來另有一個計劃，就是要在香港創辦一個私立的專上程度的小型大學。我與復觀兄都贊成這個計劃。關於這項計劃的實情大致如下：

一九四九年春國內學人流亡來香港日漸增加。其中錢穆、謝幼偉、崔書琴及吳文暉等四人，也想在香港創立一所私立專上學院，初不料在港九創辦學校，並非易事，不但他們手頭資金太少，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，且人地生疏，根本無從下手。香港雖為華人社會，但政治制度與過去大陸情形完全不同。他們再三再四，反覆考慮，不能產生可行的計劃。而最不幸者，發起人之一吳文暉先生中途退出。另一發起人謝幼偉先生，應約返台。崔書琴先生為國民政府立法委員，不能久留香港，故也隨時準備赴台。至此，四位發起人只剩下錢先生一人，實在孤掌難鳴。於是他乃商請唐君毅先生及我兩人，參加創辦計劃中的學校。

學校定名為「亞洲文商專科夜校」，為大學程度。因無自備校舍，乃租用佐頓碼頭附近偉晴街一家中學的三間課室，登報招生。至於課程，當時並無嚴格的系別，祇籠統歸納為文史、哲教、及經濟三系，由錢先生主持文史，唐先生主持哲教，並由我主持經濟系有關的課程，崔書琴先生則擔任法學，其他課程視臨時

約請教師而定。學校成立後，選定十月十日為校慶節，表示我等在思想上特別重視國家觀念及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。

就是這樣，這顆細小的文化種子悄悄的播下了。沒有大吹大擂的宣傳，也沒有名流要人的開幕剪彩。在一九四九年雙十節的晚上，師生全體二三十人，舉行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慶祝會，慶祝這個海外文化教育事業的誕生。所有出席的都多多少少講了幾句話，說出各人心中隱藏的理想和信念。錢先生談宋元時代的書院制度，比喻我們這一樁小小的新興事業，充分發揮了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價值。唐先生的講話偏重中國文化與其遭受的危機。輪到我說話的時候，我感到躊躇一時不知說什麼是好，結果只簡單的談到武訓行乞興學的意義，可謂即情即景的臨時發言。不是嗎？所有在坐的都是流亡難民，有國難投，有家難歸，身無長物，而又要辦一所自己理想的學校，除去師生集體行乞之外，還有什麼辦法！其他出席的先生和學生講了一些什麼話，我已記不得了。但當時大家情緒熱烈，充滿信心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夜校成立表示我們完成了第一個努力的步驟；下一步是什麼呢？我們面臨着許多嚴重問題，幾乎都是不可克服的：

我們需要一個像樣的校舍。當時租用的地方過分簡陋，狹小，喧鬧。

夜校上課時間太短，教學雙方都極感不便。

當時幾乎沒有任何設備可言，尤其圖書更是極端缺乏，所有的課程都是大班講演。

我們缺乏最低限度的經濟條件，甚至每月房租都成為致命的威脅。教師全部自費，學生絕大部份是免費生，其情形之嚴重，出人想像之外。

這些困難問題壓迫得我們喘不過氣來，於是見面就談，而愈談愈覺心情沉重。這個樣子的學校怎樣生存下去？會不會夭折呢？我們沒有一般私立學校的條件，沒有政府的支持，沒有宗教團體的協助，更沒有大企業的资金為後盾。總之一句話，要希望這樁文化事業能生存並能發展，必需寄望於任何方面的大力支持。

這個力量在那裡？

當我們感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，猛然出現了奇蹟式的變化。這變化結束了我們學校的第一個階段，同時把學校的發展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。關於這一點我在下文中還要報告。

一九四九年冬，「亞洲文商專科夜校」誕生未及半年，程兆熊先生自台灣招來新生十數人，一時苦於無法安頓，一無教室，二無宿舍，學生雖非來自大陸流亡青年，但大多數皆無力解決食宿問題，學校大窘。當時又適逢交通工人罷工，港九形勢頗為嚴重，夜校之艱難困苦達於頂點。

適於此時，王岳峯先生挺身而出，先在北角租下北角公寓，暫時安頓諸生，旋即與我等徹底討論學校之全盤計劃。王先生慨然以發展海外文化教育事業自許，接連多日商談，決定結束亞洲文商夜校，以之改組為全日上課的「新亞書院」。由於王先生之突然參加，學校的形勢與遠景，大為改觀。

王先生來自上海，為一建築企業家，富於資財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，極為熱心。他於聚談之際，每有新穎見解，而一有計劃，立即劍及履及，付諸實施，較之書生論政，有空談而無實際者，大不相同。

結束夜校，其事至易，但創設一所具規模的大學，却非倉促之間所能實現。

依王氏之見，新亞書院的規模決不小於現有的香港大學，而應為一所現代性的國際大學，內設文、理、法、商，醫各學院。然王氏亦知，大處着眼，小處入手，為事業的不易之理，故主張首先租用比較適用的房舍，作為初步立足之基礎。新亞書院初步的藍圖，概括如下：

停辦夜校，改組為全日上課的新亞書院，向香港政府教育司署重新登記。

教務組織，分文史、哲教、經濟、商學等系。

學校人事，由錢穆任校長，唐君教授任教務長，張丕介任總務長，趙冰大律師任法律顧問，王先生自己負建校之責不居任何名義。

籌謀經費，物色及裝修校舍，概由王先生負責。

學校改組後，同人及學生皆大感興奮。

新校舍位於九龍深水涉桂林街，包括第六一、六三、六五號樓宇的三四兩層。此新建樓宇，間格及裝修皆甚方便。一切教具及設備皆由王先生繪圖監製，且日夜進行，以期於一九五〇年三月初正式遷入開學。

桂林街時期的新亞書院就此開始。

新亞書院改組籌辦的消息，引起了香港社會的注意，尤其大陸學人流亡來港的，對之更表現了同情的熱心。新亞書院的成立與以後的發展，大部分得力於他們的鼓舞與協助。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的數年間應約來院任教的許多學者，往往白盡義務，或只領取一點微薄的車馬費。他們任教，或半年或三月，或只講

演一、二次，然後各奔前程。但新亞書院的消息，也賴他們的同情報告，而傳播於世界各地。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四年間，究有多少這類新亞之友，我已無法記憶。以下列舉少數學者的姓名，當可概見一斑：

吳俊升，胡建人，任 泰，劉百閔，羅香林，梁寒操，張純漚，羅夢冊，余天民，黃華表，左舜生，蔡貞人，伍憲子，陳伯莊，徐澤予，衛挺生，卓宜來，凌乃銳，夏濟安，孫祁壽等等。

這些學者的聲名對於流亡青年的號召力之大，是無法形容的。再加上若干其他人士，或學術團體及出版界的協助，新亞之名乃不脛而行。失業的流亡青年，三三五五，請求入學。他們並非為文憑而來求學，而只是為了一個理想。他們需要中國傳統文化的指導，以求了解故鄉故國種種災難的造因，以及國家民族的前途。這是純潔青年要求受教育的機會，他們在別處無法得到的，希望在新亞可以入學深造。不過他們的窮困程度更甚於學校。他們希望無條件免費入學，同時更希望學校協助他們，解決最低限度的生活問題。可惜我們有心無力，只能收容他們中的一小部份。在那一時期，新亞書院是一所名符其實的流亡學校，由流亡教師與流亡學生共同形成的海外教育事業。凡當日參加新亞的師生，回想起那段艱苦生活，莫不感慨系之，成為終身難忘的一段歷程。也只有那一時期中的師生，纔能體會到所謂新亞精神，「手空空無一物，路遙遙無止境」的真正意義。也只有他們能深切了解新亞是一個大家庭，衷心誓言「艱險我奮進，困乏我多情」。

新亞書院改組成立，遷入佈置整齊的校舍，依我們的理想聘定教師，開設課程，校內師生自然非常興奮，校外人士也為之欣羨不置。人人相信，新亞將有一番光明的前途。

然而那時的新亞畢竟還是一株纖弱的幼苗，還經不起風雨吹打，因新亞本身

還缺乏自立生存的條件。而且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似乎有一種黑暗勢力，和它的命運作對。一九五〇年，中國大陸的形勢鬧得天翻地覆，港九也是紅塵滾滾，人心惶惶，影响到一切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。新亞書院自然也難以倖免。由於王岳峯先生的企業受了致命打擊，新亞書院也立即陷於面臨深淵的危險境地。新亞書院的經濟基礎突然成了問題，而且自此以後，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層出不窮。

我們遷入新校舍時，王先生宣佈專任教授八人各支月薪伍佰元，連同房租與雜費，學校全年預算將近十萬元。這是一筆龐大的數字。開學兩月之後，王先生事業不遂的不幸消息，已經傳開，人人感到惶恐不安。當時負責學校的是錢、唐二先生與我，焦急萬分，教授薪金可以暫緩支付，而課程必須繼續；房租必需按月支付；少數工讀生的生活費不可減，也不可少更不能停。如何是好？於是我們三人，連同若干文化教育界的朋友，決定用武訓行乞興學的方式，四出勸人捐募，一佰也好，一仟也好，必須募到維持學校生存的最低數字。港九兩地的朋友，莫不熱心協助，但他們多半也自顧不暇，捐助一兩次，便無能為力了。我們不停的撰寫論文，向報紙和雜誌投稿，領取微薄的稿費，雖是零星收入，也聊勝於無。這時新亞書院之窮，窮出了名。我們的艱苦奮鬥，也成了少數人的話題。

第二個嚴重的打擊發生於一九五二年，也正是學校災難重重，形勢最為嚴重的期間，比較經濟困難，更不易克服。因為經濟困難還可以徐圖補救，而這一次的打擊却與新亞書院的存亡攸關。實情經過，簡括如下：

一九五二年香港政府頒佈商業登記條例，所有港九私立學校都要到工商署辦理登記，自認為營利企業，並繳登記費二百元。此一消息在新亞同人中，引起了很大的激動。因為依照中國傳統教育觀念，學校並非營利團體，而是為教育而教育的事業。當時新亞書院窮到如此地步，不但無營利可言，且根本上堅持中國文化傳統，為教育而教育。小小一群師生所自豪的也全在這一點。我去拜訪學校顧

問趙冰大律師，詳商對策。據他指出，新亞必須辦理登記，不過不到工商署，而到高等法院申請登記。我們必須用實事證明，新亞並非謀利的團體。要完成這一套法律手續，我們必須準備政府的調查，同時又須請一位律師，起草學校的組織大綱與條例，一一送呈法院，然後等待批准。這時錢先生因為學校募捐，前往台灣。我寫信問他關於學校登記的意見。他的回信是斬釘截鐵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，更不可造成中國文化的污點，必要時，寧可關門大吉！

錢先生的態度堅定，本在意料之中，但要實行確萬分艱難：接洽律師，起草學校的條例，以及奔走於法院與律師樓之間，往返磋商，曠日廢時。不幸趙先生又當久病之餘，不勝煩囂，暫停大律師職務。為了挽救學校的命運，趙先生乃挺身而出，獨力承擔這一大堆困難問題。回想起來，至今為之歉然。最後高等法院批准了我們的請求，而時間上已經是一年之後了。錢先生及各全人，尤其趙先生，熱心維護中國文化傳統，這種精神是我們終身難忘的。而香港政府對於我們這個流亡學校，也算仁至義盡了。

新亞書院桂林街時期的學生，是一羣熱烈嚮往中國文化的青年，如果拿他們和許多其他國立與私立的大學生比較一下，他們顯得完全不同。

那一時期的學生們，大多數是由中國大陸流亡而來的青年，他們嚮往中國文化傳統，有強烈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思想，雖在流亡之中，不因個人生活困難而氣餒。他們把學校感情化了，當作一個大家庭，在生活極端困頓之下，人人努力學習，工作，對師長衷心的崇敬。他們在課程之外，鍛練自己，接受了文化使命。我們看到他們入學時的難民形象，衣衫襤褸，營養不良，我們也看到他們心靈上的創傷，以及他們所抱的對於光明的前景的期望。因為學校小，經費奇缺，我們所收容的學生極其有限，所以許多青年不得其門而入。至於這些少數被收容的學生，也正是最貧困的。貧病相乘自是無法避免的，他們的健康情形，一望而知，

使人爲之不忍。學校無醫藥設備，對他們無法一一照料。對病勢特別嚴重的，如肺病患者，我們接洽私人醫生，替他們免費治療，打針，服藥，或送入醫院療養。學校不僱用工人，打理雜務，乃創行工讀制度，使學生獲食宿之所。當日受照顧的學生，今日早已畢業多年，分佈於世界各地，在學問上與事業上各有表現，聞之令人欣慰。學校是一個家庭，只有這些學生纔能體會到這句話的真正意義。

尤於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間曾就讀於新亞書院的學生，或任教於新亞的教師，以及協助新亞書院發展的校外人士，事後談及新亞往事，莫不津津樂道所謂「新亞精神」。

何謂新亞精神？學校方面，對此並無嚴格一致的解釋。有時稱之爲桂林街精神，有時稱之爲人文主義精神，亦有時稱之爲家庭精神。因為彼此會心，所以也不待進一步分析解釋。此種心理狀態，頗爲玄妙有趣。

我以爲，對此若實若虛的概念，無法詳解，亦不容強解。但回顧當日學校的情形，師生共同爲理想而奮鬥，社會人士對新亞的同情與協助，又非用此一概念，無法表達此一共同心理狀態。當時學校文獻中，比較能反映事實的真象者，有三種，可視爲此種精神之具體流露。

一爲新亞校歌，首先創用新亞精神一詞，代表師生共同之嚮往，自我策勵，等於新亞的誓詞。歌詞可謂激昂慷慨，歌譜爲黃友棣先生的創作。

二爲學規：新亞學規二十四條，詳列吾人的教育理想，對任教者的督責，對學生的激勵，而綜合一句，「求學與作人，貴能齊頭並進，更貴能融通合一。」學規產生於學校遷入新校舍不久之後，參與學規起稿者除錢、唐、張三人外，尚有吳俊升先生。我等最嚮往的學校制度，如宋元以來私人講學的書院制度，故「學

規」亦充分流露我國古代的崇高理想，而使新亞顯然有別於現代流行的大學制度。

三為新亞書院連續數年舉辦之文化講座，這是本校的創舉，亦可認為新亞精神的具體實現。其經過情形，大致如下：

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間，由大陸流亡來港的學者甚眾，或稍留即去，或暫為觀望，等待機會，以便有所作為。但大多數學有專長，並熱愛中國傳統文化，而無機會以展其所長。新亞遷入桂林街校址之後，學人來訪者既多，但限於學校規模與經費，無法一一聘請，於是創立史無前例的文化講座，利用晚間無課的時間，每週洽請校外學者作公開的學術講演。其講演內容，由講者自行決定。四樓大教室可容百人以上，聽眾來自四方八面，不少為大陸時期的知名之士，願藉此機會略慰流亡生活的寂寞。應約來校演講者，當然無報酬，亦不受學校任何約束，只是自由講學而已。講座的情形類似目前港大與中大的校外課程，所不同者，講演人無學校的聘書，無事前編定的課程表；施教者，不以教師自命，受教者亦不以學生自居。每次演講之後熱烈討論，充分表現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的精神。我與錢、唐兩先生所講的次數最多。計自講座開始至一九五四年結束，講演者四、五十人，聽者熱烈參加，大教室座無虛席。文化講座在這三、四年中舉行講演達一百五十次，內容遍及新舊文學、中西哲學、史學、經學、理學、各大宗教思想、中國傳統藝術、戲劇、繪畫、詩歌、社會學、經濟學等等。講演者為吳俊升，劉百閔，林仰山，徐訐，董作賓，沈燕謀，羅時憲等先生，不能備載。若非有共同的精神條件，如何能動員如許學者，參加此一盛會。故國之戀與傳統學術文化之思，實為根本動機。稱之謂新亞精神之具體表現，似不為過。當日的講座多無事前撰就的講稿，亦無有系統的記錄，幸得孫鼎辰先生不畏艱鉅，收集不完整的筆記，補充修改，由新亞研究所出版，題名為「新亞書院文化講座錄」。吾人回念前塵，當日情景，宛然如在目前。

以上三事，雖各不相同，但確是新亞創立初期的精神表現，或由於表現的場所而稱之為「桂林街精神」，亦或稱之為「人文主義精神」，或「新亞精神」。要在顯示新亞在學術文化活動中確有其獨特之處，非一般學校所比擬。

一九五二—五三年是新亞書院為生存而鬥爭的關鍵之年。經費來源斷絕，無法支持校舍房租，及少數教師的鐘點費。我等雖四出奔走，但或借或捐的數字太小，杯水車薪無濟於事。錢先生為了捐募經費去台灣，某日在台北淡江英專演講。不幸房頂塌陷，打得他頭破血流，幾乎喪命。消息傳來，全校師生大為震驚。其次為法院登記，辦理經年，迄未獲准。同時一部分教師又先後離港，各奔前程，學生之中亦有多人去台，或去海外深造。一九五二年夏第一屆畢業生三人，假六國飯店舉行畢業典禮。全體師生及眷屬朋友，不過五、六十人，典禮隆重而熱烈，但對學校前途的隱憂，見乎辭色。

恰於此時，否極泰來，使學校又一次戰勝厄運的威脅。

美國在香港設立亞洲協會。並由艾偉（JAMES IVY）先生主持其事。艾偉先生結識本校學生多人，因而詳知本校宗旨，歷史，及現況，慨然有意協助。艾偉為一美國青年，嚮往中國文化，經數次懇談，決議新亞書院接受該會初步的援助，藉建立新亞研究所之名，由該會撥助專任研究人員的研究費。而以其中的半數，轉交新亞書院，以應付學校最低限度的經費需要。研究所設立於太子道，一層租用的房屋，有專任教授四人，及研究生四名。艾偉先生兩次來港主持亞洲協會，均對本校備極關懷。賴他的熱心協助，本校乃得打開國際援助之門。新亞以後的發展，乃步入新階段，影響本校此後的發展，極為重要。

繼艾偉先生之後，而來香港爭取本校的合作者，為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雅禮協會。該會在湖南辦雅禮中學及湘雅醫學院，歷有年所，成績卓著。大陸變色以

後，此項合作事業中斷，乃擬就台灣、菲律賓、新加坡，和香港四地中國人辦理的教育或醫藥事業之中，選擇一處，為經濟協助的目標。盧鼎（HARRY RUDIN）教授攜帶此項使命，來港調查。到港後，因本校學生奚會璋君的介紹，到桂林街校舍參觀。他對新亞簡陋的校舍，與少數師生，自然一目瞭然。其時學校方面與盧鼎教授並無接觸，乃由他提議約請本校教師數人，到半島酒店餐叙。（編者按：此段所述與錢穆〈新亞書院創辦簡史〉及盧鼎〈一九五三年東西釗之會〉所記相左，請參看。）談話開始，趙冰先生告知諸同人及盧鼎教授「一個重要消息」，高等法院已正式批准本校為為教育而教育的社會事業，可以豁免本校的商業登記。仝人及盧鼎教授皆大歡喜，此為一年以來之艱苦鬥爭的收穫，趙先生之功最偉，而給盧鼎教授一最深刻的印象。數日後本校舉行第二屆畢業典禮，盧鼎教授應約觀禮，目睹本校師生，歡聚一堂，熱情洋溢，與其不折不撓的精神，深為感動。於是援助新亞之計乃定。次年一九五四年，雅禮協會派駐香港的代表郎家桓（CHARLES H. LONG）先生來港履新，執行雙方合作計劃，從此新亞書院的發展乃進入全新階段，規模愈大，合作者愈多。繼雅禮之後，本校於一九五九年，接受香港政府的建議，改為專上學院，參加統一文憑考試，同時即接受香港政府的補助費。再後數年（一九六三年），中文大學成立，新亞書院為中文大學三個基本成員學院之一，以至於今。

關於新亞書院一九五四年以後的發展狀況如何曲折，所遭遇實際情形如何複雜，以及其奮鬥如何艱難，校慶特刊另請有他人執筆報導。本文所回憶者，限於新亞誕生的前後，且往往語焉不詳，幸乞讀者諒之。

（原載《新亞書院二十週年校慶特刊》，一九六九年。）